



十九世纪 俄国文学史纲

094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 ВЕКА

● 刘亚丁 著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

刘亚丁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

刘亚丁 著

责任编辑：陈丽莉 封面设计：冯宪洁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印张8.875 字数180千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7-5614-0229-5/K·22 定价：1.60元

序 言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是繁荣的，为这段文学作传也就很兴旺，已经有了很多人写。还会有更多的人要来写。原因何在？任何历史都是共时性的，都是今天的人对既往的史料的阐释。文学史的素材是历史的，而写文学史的人的观念则是当代的。“当代”的更替，就会为同一段文学翻新出不同的文学史来。除此而外，如果将文学史料比作“硬件”，将写文学史的方法比作“软件”的话，不同的方法能用同样的材料建构出完全不同的著述。黑格尔的《美学》和丹纳的《艺术哲学》以论带史，由于他们的方法迥异，从古到今的世界艺术史在他们的笔下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甚至连分期的时限都不太相同。新的观念、新的方法产生着新的文学史。

这本文学史纲以文化的走向为基本线索。在十九世纪的俄国，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发生了激烈的撞击，两种文化由冲突走向对话，而俄罗斯传统文化在这种冲突、对话中获得自我意识，繁荣起来。在短短的一百年中文化走向的这种戏剧性变化，迫使每个作家要迅速作出自己的选择：有的作家认同西方文化，借以改造俄国，建立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制度（文化的一个重要层次），建构俄罗斯民族的新的文化心态（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层次）；有的作家执著于传统文化，试图弘扬其精华，以同西方文化抗衡；有的作家的文化认同前后有了变化，先是认同西方文化，旋即又复归传统文化，在观念中完成了两种文化的融合。而作家的选择既定，又能反过来促使某种文化消长。作家文化认同的不同倾向，

明显地在他们的全部创作中表现了出来。这样两种文化的冲突、对话就是本文学史的基本线索。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基本线索，划分这个世纪文学的分期，确定作家的类型。

以文化走向为线索来写文学史有明显的优越性。作家的文化认同倾向是一个高层次的概念，它能够解释诸如世界观之类的概念所无法解释的问题。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是贵族，一个是平民，他们却有几乎相同的思想观点。以阶级的政治立场为核心的世界观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而文化认同倾向就能解释他们的观点的一致性这个问题。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全人类、全民族的作家，他考虑问题往往能超越狭隘的阶级、阶层利益的限制，而站在全人类、全民族的立场上。文化属于民族和人类，而不属于阶级、阶层。文化这个概念与民族和人类属于同一层次。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走过了相同的选择文化的道路：他们早期都认同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失望后，转而重新认识俄罗斯传统文化，进而发现了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村社和群体主义意识，因而他们晚期都致力于两种文化的融合。

过去的俄国文学史都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是作家的具体操作方法，其涵盖力是非常有限的。而过去的文学史将很多问题都约简为创作方法，不是削足适履，改变创作实践的面貌，就是无限制地扩大创作方法的外延，甚至将创作方法这个操作方法人为地上升为一般的方法论。比如过去的文学史在解释莱蒙托夫1835年开始发生的变化就是这样。有的文学史认为莱蒙托夫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有的认为他仍是浪漫主义者；还有学者认为，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兼而有之。持三种观点的学者们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这些学者共同的错

误是，将低层次的操作方法——创作方法当作高层次的思想观念。其实莱蒙托夫的转折是在文化认同上的犹豫动摇，即他看清了先前认同的西方的价值观念——个人主义的弊病后，对之产生疑虑，对上一代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赞同（详见莱蒙托夫一章）。用创作方法的变化是不能反映莱蒙托夫在文化认同中的变化的。基于笔者的上述认识，本文学史用文化认同倾向来划分作家类型，而不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来为作家定性。

本文学史纲，以文化的走向和作家文化认同的变化为依据，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十九世纪初到40年代初，是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俄国时期，但代表传统文化的斯拉夫派也开始了活动。该时期包括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文学集团：十二月党人文学、普希金、莱蒙托夫，应包括斯拉夫派文学，因笔者手头资料有限，暂付阙如。第二个阶段从40年代到60年代，这个阶段是俄国精英分子开始反思文化认同问题的时期，他们逐渐开始看到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两种文化的融合，代表作家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三个阶段，从70年代到十九世纪末，这个阶段是俄罗斯传统文化在整合了西方文化合理因素之后的繁荣期，代表作家和集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民粹派文学。本书如有幸出增订本，将补上暂缺的斯拉夫派文学。在展开具体作家分析之前，本书对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文化背景，文学与民族文化心态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民族特征，作了宏观鸟瞰，以突出这本文学史纲的观点。

以这种方法和形式来描述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既然是尝试，是成功，还是失败就难以逆料，让时间来评判它吧。

目 录

序 言

第一编 绪 论

- 第一章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文化背景…………… (1)
第二章 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15)
第三章 俄国文学的民族特征…………… (28)

第二编 西方文化昂扬期的文学

- 第一章 十二月党人文学…………… (39)
第二章 普希金…………… (62)
第三章 莱蒙托夫…………… (87)

第三编 文化认同转折期的文学

- 第一章 赫尔岑…………… (119)
第二章 车尔尼雷夫斯基…………… (140)

第四编 民族文化繁荣期的文学

- 第一章 民粹派文学…………… (170)
第二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
第三章 托尔斯泰…………… (217)
后 记…………… (275)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文化背景

问题的提出和前提

丰收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已经是九十年前的事了。近一个世纪的介绍研究，本可以廓清迷雾，入其堂奥，但事实上仍有不少斯芬克斯之谜，有待人们去破解：为什么从未到过西欧的普希金成了俄国的拜伦，而数次造访西欧的列夫·托尔斯泰却是俄国民族文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为什么近代文明较薄弱的前五十年，“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成了俄国作家的楷模，而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之时，一股强劲的俄罗斯古风却把他们赶出了文坛；为什么赫尔岑、奥加辽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政治倾向不同，却都把俄国的村社看成是摆脱资本主义恶魔的护身符？所有这些问题在文学自身之内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更大的参照系中才能找到答案。这个参照系就是文化，准确地说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

从结构看，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次（人化自然，或对象化的劳动），心物结合层次（政治制度、科学理论、教育制度、文学和艺术的物质载体等）、心灵层次（文化心理结构、文学和艺术等）^①。文学居于文化中的最深的层次，文学的演变可以看成是文化变革的最后成果，是对文化心理结构演化的记载。这本文学史纲在东西方的大背景下，

从文化的角度切近文学，先描述出十九世纪俄国文化的板块，然后寻找重要的作家在背景中的位置。

文学属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它的变革体现着价值观、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演变，反过来，弄清楚了文学的嬗变，就能推知文化心态的变革。我们通过描述文化——文学的演变，不难触及俄罗斯民族心理近代化的脉搏。也许这就是本书的价值之一，帮助人们理解，从彼得一世开始的俄国的近代化，是如何在列宁时代完成的，俄罗斯人的民族心理结构是如何更新的。

• ◊ ◊ ◊ ◊ ◊ •
◊ 物质文明 ◊
◊ 的近代化 ◊
• ◊ ◊ ◊ ◊ ◊ •

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俄国基本上完成了物质文明（文化的第一个层次）的近代化。

彼得一世即位（1682年）的时候，俄国是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部门都使用农奴。早在1443年西欧就有了炼铁炉，俄国到1636年才建成了第一座炼铁炉。彼得一世不愧是“打开通向西方窗口”的人（普希金语）。他即位后第三年创办了俄国第一所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他派遣王公贵族子弟组成的“高级使团”到西欧各国学习考察，他本人也微服随团出访。他建立了强大的近代海军，打通了俄国在波罗的海的通道，创建了彼得堡城。他认为俄国人的长胡须和贵族的华贵的大衣是俄国落后和贵族们自傲的象征，于是他亲自操刀，剪除它们。就这样，西方的物质文明，开始了受彼得一世邀请的“十字军东征”。

到十七世纪初，俄国的物质文明的近代化已颇有成效。据统计，1804年俄国约有1200个工场和矿场，到1828年已达1800个^②。当时俄国在黑色金属生产方面占据了世界第一

位，甚至走到了象英国那样发达的国家的后面。1800年俄国的铸铁熔铸量是1030万普特，而英国只有1000万普特。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出产的铸铁比法国多一半，比普鲁士多三倍半，比比利时多两倍^③。

物质文明的近代化是文化变革的第一步，制度和民族心理结构的变革则是文化深层的变革。彼得一世进行过一些制度改革（比如设立参议院）、叶卡捷琳娜二世也试图进行制度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没有实绩。十九世纪初的俄国，在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方面依然非常落后。历史把制度和民族心理近代化的任务留给了十九世纪。

• ~ ~ ~ ~ ~ •
◇ 两个文化板块 ◇
• ~ ~ ~ ~ ~ •

十九世纪是以制度改革的失败的尝试开始，以制度改革的成功和民族心理的近代化结束的。前者以斯彼兰斯基的计划和十二月党人的行动为标志，后者则是以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来宣告的。制度改革的尝试必然要推动民族心理的变革，制度改革的成功则意味着民族文化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俄国的精英分子以西方的异质文化猛烈地撞击沉睡的俄国，而一旦它被撞醒之后，后五十年民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迅速繁荣起来。从横向看，传统文化不断与西方文化撞击、对话、融合、交流；而从纵向看，传统文化能够不断超越自我，回归自我，这样在极短的时期内就形成了色彩纷呈、内涵丰富的极发达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化。它既不同于以希腊为源头的文化和以希伯来为源头的文化，又不同于发源于中国和印度的东方文化，正因为如此，它能够傲然侧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下面就分别论述，十九世纪前后两个五十年，传统文化

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情形。

• ◊ ◊ ◊ ◊ ◊ •
◇ 对前五十年分析 ◇
• ◊ ◊ ◊ ◊ ◊ •

前五十年，西方文化初次出现是一个低回的引子，这是1809年斯彼兰斯基的名为《国法通论》的改革草案。斯彼兰斯基这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博览欧洲的政治文献，据此草拟了内容广泛的改革计划，以便在维持君主专制的条件下，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敌视任何改革的达官贵族的反对，他的计划还在摇篮之中就夭折了。十二月党人的行动和他们的政治纲领，是异质文化的激昂的序曲，具有“蹈厉之美”，这一序曲的变奏与另一个俄罗斯风格的、平和的、温暖的“田园牧歌”式的主题的对答贯穿于整个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前五十年，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冲突的要素罗列于兹：

传统文化

村社（肯定“公有制”）

专制制度

群体主义

顺从

善

有神论、神秘主义

西方文化

土地私有

共和或宪政

个人主义

反叛

恶

无神论、科学

一般地说，“官方民族性”的拥护者和斯拉夫派认同民族文化，而十二月党人及其追随者和后来的西欧派力主引进西方文化。在这些要素中政治制度和土地所有制是较为重要的，其他要素或多或少都是从它们派生出来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的专制制度和村社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毋庸赘言，需要说明的是十二月党人所追求的政治制度和土地所有制。

关于政治制度，十二月党人的主张是不统一的，激进的革命家力主建立共和国，较温和的革命家主张搞君主立宪制，多数人持前一种主张。1820年在幸福联盟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听取了彼斯特尔关于“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利弊的报告后，一致决定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从这个时候起在贵族革命家内部共和思想战胜了君主思想。南社的彼斯特尔以及北社的雷列耶夫、阿·别士土舍夫、尼·别士土舍夫、普辛、雅库什金等人成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彼斯特尔说：“我从内心是个共和主义者。除了共和政体，我再看不到对俄国更大的幸福，更高的满足”^④。与此同时，十二月党人中的温和派与共和派在立场上有较大的距离，他们认为君主立宪制是俄国最好的选择。但他们也是反专制制度（самодержавие）的。十二月党人关于土地的设计也几经变动，从彼斯特尔等人起草的《俄罗斯真理》来看，基本思想是：赎买中等地主的一半土地，这些没收来的土地在每个乡中“平均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社会的财产，另一部分是私有财产”^⑤。显然十二月党人不同于后来的斯拉夫主义者，他们在追求土地公有制的前题下，承认了在当时俄国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由于否定专制制度和承认私有制的某种必要性，产生出了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十二月党人把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写进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他们指出，在他们未来的共和国中“国家大厦的整个基础”是“个人的自由”（собою личность）^⑥。个人的自由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捍卫这种自由是政府首要的责任。自由，是一代人的旗帜，一代人的信念，是他们奋斗的动力。在莱蒙托夫笔下，童僧为了让自己的幻想飞向“人们象苍鹰般自由自在的”奇异世

界，虽九死犹未悔。自由，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母题，每一个对时代稍有敏感的诗人和作家都要激动地讴歌她。在当时要获得个人的自由，首先必须肯定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权利，这种肯定内化为了深层的心理结构，这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因此，我们看到，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信奉个人主义是颇为盛行的。普希金说：“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可能性就是自由”^①。莱蒙托夫塑造了为了使自已从深重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不惜伤害周围一切人的毕巧林。普希金在二十年代末创作了一系列小悲剧，如《石客》、《怪客骑士》、《莫扎特和沙莱里》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揭示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其结局是个人的毁灭。普希金对毁灭的个人寄予深切的同情，肯定他们所体现的感性生命。正如一个普希金研究家所说：在这些小悲剧中，普希金“肯定了聪明的伊壁鸠鲁主义，肯定了富有人性的人的名声”^②。别林斯基也把普希金心爱的人物奥涅金称为“被动的利己主义者”^③。

与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相对立的，是由俄国村社（Община）的公有制产生出来的群体主义价值观。斯拉夫主义理论家基列耶夫斯基认为：俄国没有绝对的土地私有制，村社的土地所有权制约了地主和领主的土地所有权^④。斯拉夫主义者把俄国村社这种近代社会中的古代的活化石，看成是拯救人心不古的俄国的法宝。康·阿克萨科夫以富有感情的笔触揭示了俄国村社与群体主义的关系：“一个村社是那些已经放弃了利己心的个性的人们的联合，这些人表达了他们的心愿，这就是一种挚爱的行为……因此一个村社正象在歌队里一样，个人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而是按照共同的音调让人们听到所有的和声，所以个人在村社中并没有被埋没，而是放弃他唯我独尊的态度，赞成共同的心愿——于是

有理性的人们和睦相处的高尚现象应运而生；一种兄弟关系即一个村社就出现了——这是人类精神的巨大的成功”^①。斯拉夫主义者看到了西方饱受个人主义折磨之苦，而村社产生的群体主义精神是富有诗意的，因而热心于弘扬这种精神。

在西方文化中，由于对自由的追求，在专制制度之下必须反抗现实，积极奋争，“叛逆”就成了追求自由的人们的“桂冠”。他们歌颂叛逆，歌颂与现存的一切相敌对的“罪恶”。普希金在若干首短诗中塑造了一个正面的恶魔的形象，在《加利甫颂》中把传说中的魔鬼写得动人而可爱。莱蒙托夫在长诗《恶魔》中塑造了一个恶魔的形象，恶魔宣称“我是认识与自由的皇帝”，“我是上天的敌人，宇宙的灾难。”同时，莱蒙托夫的毕巧林也富有这种恶魔气质。因为“恶”，毕巧林受到当时批评家的攻讦，别林斯基却极力为他的“恶”辩护^②。

在民族文化的群体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善良为上的伦理观。谢·阿克萨科夫在自传性三部曲中塑造了一系列本性善良的农民的形象，把善良看成是他们性格的第一要素。深受斯拉夫主义者影响的果戈理，甚至在《死魂灵》第一部中也没有忘记地主的“善良”。鲁迅说，果戈理“共写了五个地主，讽刺固多，实则除了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别林斯基也说，果戈理写了地主的“否定美质”。所有的斯拉夫主义者都极力要在每个俄国人身上去发现和肯定善良。

在西方文化中有一种强有力的“无神论”精神。十二月党人在认真研究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推翻了上帝，他们认为生命是微粒组合的一定方式，地球上的生命并不是神造的。克

留科夫说，他在知道了生命不是神造的，而是物质的属性之后，成了无神论者。鲍里索夫甚至设想其他行星上也有生命存在^⑩。十二月党人把反对教会同反对专制制度结合了起来。雷列耶夫和阿·别士土舍夫在一首鼓动歌中写道“第一刀／把贵族和重臣的小命要。／第二刀／让神父和虔信者灵魂出窍”^⑪。普希金在流放基什尼奥时期，被强迫实行斋戒，参加祈祷式。此时他写信给华·达维多夫说：“我变得聪明起来，我口是心非——／我吃斋，我祷告，我坚信／上帝会饶恕我的罪行，／就象是宽恕我的诗行，／前两天我舍弃诗的幻想，／去诵祈祷书，做弥撒，／还品尝干蘑菇”。只有否定了上帝的人，才敢于用这种调侃的语气谈论他。他还说：“理智寻求着神灵，可是心儿却找不到它”^⑫。

与此相对立，在民族文化中的宗教，准确地说东正教（православие）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向沙皇提出把“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作为教育的基础。就此形成了“官方民族性”理论，斯拉夫主义者谢维辽夫和波果金是该理论的热心宣传者。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国的正教是基督教的嫡传正宗，它是直接从拜占庭继承来的，而西欧的基督教是从罗马传下来的。拜占庭的基督教没有经过罗马这一中介。所以俄国的正教是一种基督精神保持得最完整、最纯粹的宗教，比西欧的基督教更优越。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民族是最虔信上帝的民族。果戈理也持这种看法。斯拉夫主义者甚至将哲学混同于神学。他们认为，哲学应该成为“理智教育”（即科学）和信仰之间的“思想传导”，而理智又须服从信仰。他们主张真正的哲学应该成为“基督教的哲学”^⑬。

在世界的背景中，当时俄国的精英分子具有拥抱一切的

恢宏气度，他们对西方的较先进的文化作大胆的价值认同，认为只有它才能消除俄国的野蛮和落后。从这里反而表现出了他们对自己民族的自信。别林斯基说，在当代世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他们毫不顾忌地互相借鉴摹仿，一点也不害怕自己的民族性。历史说，这一类顾忌，只有对精神上无力的、卑微的民族才会是实在的^⑩。“官方民族性”的宣传者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惧外情绪。风高月黑，胆小的人紧闭门窗，坐在屋内想象着开门后的可怕后果；谢维辽夫说，“在我们跟西欧真诚、友好、亲密的关系中，我们象跟一个身患严重性传染病，被一种危险的气氛包围着的人打交道似的。我们跟他们接吻、互相拥抱，分享思想的美食、共饮感情之酒——却不曾留意到在我们漫不经心的交往中，已经隐藏着病毒，在宴乐之中没有嗅到他已经在散发来日死尸的臭气了”^⑪。为了维护自身的健康，他们理直气壮地控告、指责敢于跟那个病入膏肓的人偷情的人。“官方民族性”理论的宣传者指责别林斯基及其拥护者盲目崇拜西方，缺乏爱国主义和对俄国人民的热爱。

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前五十年会出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呢？我们不能不提到十九世纪初和十八世纪末的一些事件：1801年即位的亚历山大一世撤销了对外国货物和书籍进口的禁令，准许俄国人到国外旅游。促使异质文化扩展开来的最重要的事件是1812—1814年的俄法战争。很多从军的贵族军官借此为落后的俄国找到了一个参照系——西欧，很多这场战争的参加者成了十二月党人绝非偶然。比如成为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首领的奥尔洛夫，在这场战争中，“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以个人的经验检查了由战争和渴望和平的愿望产生的感觉，认真研究了献给他的欧洲的全部文献。象很

多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和1813—1814年国外远征的参加者一样，在上述文献中，他找到了迅速重建自己的社会—政治的世界观的思想上的支持”^⑩，拿破仑的炮弹打得保罗狄诺弹痕遍地，也把半开的俄国大门彻底轰垮了。实际上以前尽管有这道门，西欧的思想家的著作也辗转传入了俄国。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1787年就有俄译本出版。十二月党人拉耶夫斯基说，他把《社会契约论》“象识字课本一样背得烂熟”^⑪。这样一些条件，在十九世纪前五十年代，使异质文化以巨大的力度震撼俄国。

此时，在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对立、冲突远远多于交流和对话，而且主要是以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两军对垒来体现这种冲突的。当然在某些主体的内心世界，也有不同的文化的冲突，比如普希金，他既有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又没摆脱群体主义意识。

• ~~~~~ •
◇ 对后五十
◇ 年的分析 ◇
• ~~~~~ •

在十九世纪后五十年，曾经被西方文化压倒的民族文化昂扬起来，逐渐走向成熟。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泛斯拉夫主义颇为盛行，连续召开了三次世界性的斯拉夫大会。泛斯拉夫主义者们提出要以斯拉夫精神和正教来拯救俄国，拯救被资本主义折磨的整个世界。他们提出要建立“全斯拉夫君主国”或“全球俄罗斯帝国”^⑫。泛斯拉夫主义活动家丹尼列夫在《俄国与西欧》中指出，西欧文化是工业的、理性的文化，而东方的斯拉夫文化要以宗教为基础。在当时，基辅神学院教授尤尔凯维奇的宗教神秘主义颇有市场。尤尔凯维奇认为人必须靠信仰才能达到真理。在音乐界出现了穆索尔斯基、鲍罗丁等五人组成的“强力集团”，俄罗斯民族风格是他们创作的最